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

苏 格 拉 底

[英]A·E·泰勒 著
周 濂 朱万国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英]A·E·泰勒 著
周 濂 朱万国 译

苏 格 拉 底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编委会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济南

苏格拉底

[英]A·E·泰勒 著

周濂 朱万国 译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市中印刷五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1插页 80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09-02129-9

B·114 定价:8.00元

编委会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玖兴	王克迅	王树人	叶秀山	付乐安
汪子嵩	李泽厚	何兆武	李金声	余丽嫦
陈启伟	侯鸿勋	高 崧	钟宇人	梁存秀
涂纪亮	管世滨	薛 华		

顾问:

贺 麟 洪 谦 杨一之 温锡增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前言

研究西方的哲学思想，首先当然要钻研原著，对历代诸家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解和诠释来；但为了丰富我们自己的见解，使这些见解有充分的历史和学术的根据，我们不能忽视西方人历来对这些著作的研究成果，我们必需参考别人的理解来形成、提出自己的见解。

对原著的诠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思想家对思想家的诠释，譬如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诠释，黑格尔对康德的诠释，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诠释，这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但这种诠释自身已成为创造性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著作自身也成了“原著”；还有一种诠释是学术性的、专门性的，它们或注重范畴之演变、逻辑结构之分析，或注重社会、历史背景之介绍，或侧重学说思想之渊源……，是一种科学性、历史性、理论性的专门研究成果。这些专门家的研究成果同样是我们研究西方哲学思想必不可少的书籍。譬如研究古代希腊哲学自不能不读蔡勒的书，研究中世纪哲学也不能置基尔松的史作于不顾。

就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近几十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对于西方古典哲学原著的翻译介绍还是比较重视的，但对于研究这些原著的专门性学术著作翻译、介绍得就很不够。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空白，我们特编选了这套《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

本丛书所选著作，都是我们认为在研究某方面原著时必须读的参考书。这些书的学术价值是公认的，在西方也是多次再版、一印再印的，因此在中译译文方面，我们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希望能和原著的翻译一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将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在学术方面的提高有所帮助。真正的思想家的著作都是启发人去思考、去探索的，对他们的著作发表“意见”并不太困难，但要使自己的“意见”言之有根、言之成理，使自己的思想不仅有“独特性”，而且有“训练”、有“教养”，使自己的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前进，就需要做一番扎实的科学研究工夫。任何独创性的思想家的思想都是“有根”、“有据”的，我们在理解、诠释、批评他们时也要使自己的思想“有根”、“有据”，所以我们应该研读这些公认的学术性强的研究著作，以提高、丰富我们自己的见解。

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同志支持我们的想法，不惜工本来承印这套丛书，我们以繁荣学术事业的名义来感谢他们的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西方哲学史研究室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编委会

Wang / op

译者前言

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称“希腊三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格拉底一改爱奥尼亚派的自然哲学传统,从自然转向心灵,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地上,从而开创了绵延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传统。众所周知,“认识你自己”,“德性就是知识”等著名哲学命题均出自苏格拉底之口。但是由于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而且阿里斯多芬、柏拉图、色诺芬等同时代作者的叙述又多有矛盾之处,致使“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成为一桩悬案。如何有效地避免不可知论,还苏格拉底以历史本来面目,就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作为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伦理学教授,A·E·泰勒在希腊哲学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诣,《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此书的中译本已于1991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在西方闻名遐迩,本书则是他在这一领域的又一力作。

作为一本学术专著,本书没有浓墨重彩地描绘苏格拉底戏剧性的一生,而是以一种平实简洁的文风,流畅洗炼的叙述给我们勾勒苏格拉底的生平与思想。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前提下,作者辨伪考订,条分缕析,层层推进,一步步地使“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形象再一次令人信服地出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又一次领略到英美学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严谨的学风。

本书篇幅不长,但却文笔流畅,说理透彻,对了解苏格拉底在历史中的真实面貌不无裨益。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当前“戏说”历史人物的文风有所警醒和纠偏。

译者

1998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苏格拉底的早期生活	(16)
第三章	苏格拉底的晚期生涯：他的审判和死亡	(46)
第四章	苏格拉底的思想	(69)
英汉译名对照表		(95)
后 记		(101)

第一章 导 言

一个伟人的生平永远不可能仅仅是不争事实的记录，尤其当他属于一个遥远的年代。即使相关的事实非常丰富，传记作家的真正职责仍在于他们的诠释；他必须透过纯粹事件去揭示被它们掩盖了的目的和特性，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建构性想象的努力。举例来说，耶稣和苏格拉底，这是两位对人类生活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人物，关于他们的确定事实异常匮乏，也许只有下列两个陈述是任何一个自称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否认的：毫无疑问，耶稣是被庞修斯·彼拉多下令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苏格拉底是在“拉凯斯之年”（公元前399年）在雅典以不虔敬的罪名被处以死刑。任何超出上述表达的陈述无疑都是个人的发挥。因此即便是如此毫不夸张的概述也不可避免地带上某些源于作者本人的痕迹：包括他对材料的独特理解，以及运用材料时的一些取舍标准。

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的思想和行为的记录。这是他从属的那个社会特性的直接结果。虽然他的晚年，我们最为熟悉的那段生涯，是一段与众不同且缺少欢乐的时期，但是就其出生和成长而言，苏格拉底属于伟大的伯里克利时代；事实上当那位政治家去世的时候，他已年过40了。虽然那个自由时代的雅典人不著书立说，谈不上有什么散文创作，但却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时代。这就是为什么除了一些独立的但并不确定的教育性典故，我们没有任何苏格拉底50岁以前的言行的同时代人的记录。直到公元前423年，他已57岁或者更老一些时

候，著名的喜剧诗人阿里斯多芬和阿米普西阿斯出于某种原因同时选择他作为时事讽刺剧的嘲讽对象；两年后，第三位喜剧家欧波利斯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我们至今仍保存着阿里斯多芬才华横溢的讽刺剧：《云》，尽管剧中的说法可能经过作者的修饰，但这却是在苏格拉底去世之前唯一一件有关他本人的文字材料。

对于这位哲学家受审和去世所留下的深刻印象，立刻激发起整个文学界的创作，那些受其影响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试图通过描写他的人格和对话来纪念他。这些作品大部分都已遗失，但我们还保存着柏拉图撰写的以苏格拉底为主要人物的对话录；色诺芬编写的有关这位大师的论辩术的回忆录，和一两本出自色诺芬之手的同类小册子；以及第三位同时代的作者，斯斐托斯的埃斯喀涅斯编写的一些苏格拉底对话的篇章。上述这些作品无疑是任何对这位哲学家进行解说的主要源泉。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把握它们。牢记这三位作者比他们的英雄年轻许多非常重要。柏拉图比苏格拉底大约年轻 43 岁，色诺芬无疑还要更小一些，虽然埃斯喀涅斯的生卒时间没有确切的记录，但他肯定和其他两个人是同时代的。^①

因此，这三个人都不可能拥有对 55 岁以前的苏格拉底的可靠记忆；当他们告诉我们任何苏格拉底的盛年或早期生活时，他

① 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 469 年或者更早。柏拉图生于公元前 428/7 年。公元前 401 年，当时色诺芬被选为统率一万退兵的将军之一，他认为自己最大的障碍是过于年轻（《阿纳帕斯》，IIIi. 25）。由此可知他不可能早于公元前 426/5 年出生。埃斯喀涅斯是作为一位年轻人被柏拉图提及的（《申辩篇》，33e），他的父亲被苏格拉底的起诉人指定为证人，如果他们真的认为这位哲学家腐蚀了他的儿子。埃斯喀涅斯是这三位作者中唯一亲身经历了苏格拉底之死的人（《斐多篇》59b），柏拉图当时病倒了（同前），而色诺芬则在“亚洲的某个地方”。

们都不是在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发的言。^①

传记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形式只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前300年——前200年）才作为亚历山大时代的特征在雅典出现。当时哲学家和诗人一块成为读者猎奇的对象，许多作者的创作只是为了投其所好。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作品大都毁失了，但是其中的要义却都保存在《名哲言行录》当中，此书的作者第欧根尼·拉尔修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这本书的最后定稿日期约为公元前200年。这本书中关于苏格拉底的叙述被生活在托勒密王朝及其后的人认为是了解和揣测苏格拉底的主要学术资料。书中保留了一些关于伟大价值的论述，并以早期作者的名义担保记录的真实性。但是亚历山大时代的传记批评水准并不高，公众对于准确性的兴趣远不如对奇闻轶事、丑闻和机智应对来得浓厚，因此作者不得不去研究读者的口味。此外，那个时代的作者虽然也试图探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的生活真相，但这一努力得不到客观的支持。资料很匮乏，且大多存于未经注释的典故之中，喜剧中虽有大量关于时事的嘲讽，不过它的含义模糊，这一点对于亚历山大人和我们来说并无二致。传记作者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写作，就几乎不能指望他们会对主人公的个性有太多的真知灼见，在这一点上那些主人公的情况与约翰逊博士正好相反，后者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传奇的中心人物。所以出于严谨起见，我们将重新回到那些可以告诉我们第一手资料的作家，这些人主要是指阿里斯多芬、柏拉图和色诺芬。

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如果在19世纪普遍信奉

① 因此当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里通过对话中那个年轻的英雄告诉我们关于苏格拉底最后一个月生活的印象时（这个青年后来成为学园中最杰出的数学家），他是在记叙那些他本人拥有的第一手资料；而当他描写早期苏格拉底与巴门尼德、芝诺会面的情景时，则是在论述早在他出生前20年的事件。

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是过于轻率的举动。阿里斯多芬，据说是位喜剧诗人，他的职业不是去说出真相而是歪曲真相。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与色诺芬、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差别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我们无法将之认同为一个人。诗人和他的观众要么对剧中的伪英雄一无所知，要么现实中的苏格拉底就是和剧中效果强烈的个人讽刺画出入甚大。阿里斯多芬的讽刺作品只能被认为是对一个时代潮流的抽象概括，而非对某个具体人物的记实描述。我们只能把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当成一个想象的产物，正如莫里哀的《达尔杜费》（一译《伪君子》），他只是选择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个名字做为标签，并未费神考虑这样选择的正确性。柏拉图，毫无疑问，他具有精湛的知识和戏剧的天赋，这使他能够绘出一幅真实可信且栩栩如生的图画。不过他的目的并不是做一个肖像画像，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不仅意味着一个伟大哲人的理想形象，而且还戴上了他本人的“面具”。这被认为是柏拉图与色诺芬之间的主要区别。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位优秀的，但却过于乏味的，关于善和道德常识的布道者，对不实际的玄思和“无用的”科学深恶痛绝。^①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位幽默大师和伟大的哲学家，有着深厚的形而上学信仰，并对当时科学的最艰深理论有广泛的了解。因此在柏拉图描述的形象中，苏格拉底被注入了天才、幽默、形而上学等诸种特性；它们是被伪装的自我启示。^② 首先这表明要想获取苏格拉底的历史真面目，正确的方法是毫不怀疑地信赖色诺芬，并

① 我们将会发现，有关这点的通常表述忽视了色诺芬本人的某些关键意思。

② 这一点至今仍被普遍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公论，即在《斐多篇》和《理想国》中阐述的所谓“理念论”是柏拉图本人在苏格拉底死后与《斐多篇》成文之前创立的。在那篇对话中，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谈及他在早年生活既已创立的理论，如果上述观点正确的话，将证明柏拉图有关苏格拉底的所有表述都毫不可信。

且用他的陈述去削减柏拉图对话中的伟大形象以与历史相符。（“历史中的苏格拉底”，19 世纪的作家经常提及这一称谓，意味着在事实上，柏拉图笔下的天才的苏格拉底并不是真实的他。）然而进一步的考察表明，对色诺芬能否胜任目击证人这一角色，同样有足够的理由加以怀疑。从他的作品中看不出他和苏格拉底曾经有过特别亲密的交往，相反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当他最后一次见到苏格拉底时至多不过 24 岁。^① 无论如何，当苏格拉底受审和行刑之时，他远在亚洲，因此他那本回忆录肯定是在重返希腊后隔了许多年才写成的，在此之前他远离雅典，没有什么机会求教询问苏格拉底圈子里活着的成员。在这本书的某些章节里，他令人困惑地把苏格拉底之所以如此热爱城邦归结为他对牧歌田园式的生活特别喜爱，而最令人费解的是，这本书根本无视它曾经宣称要解决“论辩术”这个主题的事实。同样应该指出的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色诺芬给他自己保留了一些素材——也许不是太多——用于日后创作柏拉图式的对话。上述理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本世纪初的许多一流学者都对是否可能获得关于“历史的苏格拉底”的知识抱怀疑主义的态

① 毫无疑问的是，色诺芬在公元前 401 年离开雅典加入居鲁士王子的远征军后，就再未见到苏格拉底。我们甚至不知道从这以后直到前 394 年他被放逐，期间色诺芬是否重访过雅典。柏拉图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圈子中的很多人物，但却从未提起色诺芬，由此或许可以推知他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并不十分亲密。此外，埃斯喀涅斯在他的对话《阿丝帕娅》所介绍的那个色诺芬也许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作者，但是在确认其身份的时候学者遇到了一些困难。（困难在于埃斯喀涅斯笔下的色诺芬是一个已婚的年青男子，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我们的色诺芬那么早就已结婚。）

度。^① 这种不可知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无疑是令人沮丧的万不得已的选择；在苏格拉底这个例子中我们很幸运可以避免它，只要谨慎地在普遍必然的原则的朗照之下去解释材料。

在开始讨论阿里斯多芬及其他喜剧作家的证词的价值之前，我们首先得牢记“古代雅典的喜剧”是通过对个人的戏仿来获得演出效果的，而不是就普遍的社会“典型”进行讽刺描写，所以喜剧家们要想成功，其关键在于讽刺剧的对象必须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当阿里斯多芬攻击苏格拉底的时候，后者已经是一个名人，因为这位诗人精彩的嘲讽必须要建基于可被观众指认的一些东西之上。我们同样必须牢记的是，一出成功的讽刺剧必须要立足于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共识之上。^② 尽管喜剧家并非纯粹的无中生有，但为了追求喜剧效果，他必须对事实进行曲解。所以，当阿里斯多芬在剧中把苏格拉底突出地表现为一个结合了物理学与所谓“灵魂论”思想的学派领袖时，我们既不能鲁莽地轻信他这个表述的表面意义，也不能简单地抹杀这出喜剧所反映的事实真相，我们同样也无法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叙述中确认这些从不同角度复述过的事情。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阿里斯多芬戏剧中的苏格拉底

① 第尔斯，是这些学者中最负盛名的一位，他称苏格拉底为一个“未知的X”（这一表述的权威性直接源于第尔斯致一个英国学者的未发表信件）。我没有考虑亚里士多德那个已被推翻的观点，他曾附带地提到说苏格拉底的思想可做色诺芬与柏拉图的“对照物”。苏格拉底死后大约三十多年，亚里士多德才第一次来到雅典，所以我认为正如被我本人和其他学者所证实的那样，他从未谈论过那位前辈哲学家，甚至也许从未谈到过柏拉图对话中（关于这一点我确信他的确如此）有关苏格拉底的事迹（cf. c·里特尔，《苏格拉底》，P83）。

② 《云》在舞台上并不是一部成功之作，尽管柏拉图的《申辩篇》中曾间接提到，在苏格拉底的晚年它已是一部著名的文学作品。在现存的该剧版本中，阿里斯多芬本人向我们透露了它不成功的原因：其中既缺乏喧闹的娱乐场面，又没有诙谐粗俗的对话。

以及他的“学生们”和“思想作坊”，与柏拉图的（或色诺芬的）那个随时向每一位愿意聆听者布道的苏格拉底有着强烈的反差。但是当我们意识到阿里斯多芬讽刺苏格拉底是在——或者说据信是在——柏拉图和色诺芬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我们将会认识到上述差别也许可以用时间来给予有力的解释。这也许可以证实这一事实，即45岁的苏格拉底在某些方面有别于55岁或60岁的苏格拉底，关于这一点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中也提供了事实证据，只要我们在阅读中加以足够的留意即可发现。因此在这篇短文中我将利用雅典喜剧的材料，当然，我会一直保持应有的谨慎。

当我们开始考虑柏拉图与色诺芬之间真正的，或者说确凿的差别时，使我们震惊的第一件事是这种差别总是被不适当地夸大了。除了一两点细节，色诺芬对柏拉图告诉我们的有关苏格拉底的事情没有提出任何正式的反驳，他所做的一切只是省去了某些事情，或者把它们降低到庸常的层面。他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范围很有限。色诺芬有可能只利用了柏拉图一个人的材料来组织编写他的英雄的整个传记，从早期生活直至最后的日子；试图从色诺芬提供的如此贫乏的信息中建构起任何一种叙述都几乎是不可能的，^① 尽管仔细的阅读将告诉我们他附带地证实过一些柏拉图非常独特的断言。此外，在色诺芬那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肖像中那些清晰鲜明的个性几乎完全丧失了，他忽略了许多使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成为“独创性”的英雄的特点。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苏格拉底的“讽刺”，特有的幽默感，以及他那极富个性的“苏格拉底式怀疑”——这些特点我们唯独在柏拉图那儿才能看到；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对任何事

① 我曾试图在一篇名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传记》的论文里从细节上澄清这一点，这篇论文刊登在1917—1918年《英国学院记录汇编》中。

都不抱怀疑；而且谈吐毫不幽默。当然，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苏格拉底原本就是一个平庸之辈，是柏拉图把属于自己的个性赋予他才使他成为一个第一流的人物。^①但是同样可能的另一个假设是，真实的苏格拉底具有柏拉图所描绘的这些天才禀赋，它们之所以在色诺芬的描写中被忽略，是因为作者本人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和戏剧能力。那种平庸的个性也许恰恰属于作者，而不是他的主人公。我们同样不得不意识到，色诺芬这本回忆录的公开目的要求他展现一个置身于普通光照中的苏格拉底。尽管此书在构思上缺乏整体性，很明显是部拼凑之作，但是它的平庸的特点却是由下述事实所决定的：它是针对苏格拉底受到的指控，替他作为正式申辩而公开发表的。色诺芬的目的是为了论证雅典的审判官们给苏格拉底定罪的那些前提是错误的，根据这些假设他们认定苏格拉底犯有不敬神和误导年轻人等罪状；色诺芬要论证苏格拉底其实就是那些起诉者理解中的虔敬典范，如果他能够的话，他身体力行和谆谆教诲的道德也正是每一位善良的雅典公民都愿意遵循并且让他们的后代铭记在心的。当然，正如伯奈特所说，很显然此类辩护之所以失败恰恰在于它太过成功的缘故；如果苏格拉底其人的确就象色诺芬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他将永远不会被起诉。色诺芬的辩护目的必然要求他尽可能地去掩盖他的英雄的那些可能引起头脑迟钝思想僵化的读者不安的独特性格特征。因此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我们必须牢记这条规律——它适用于诸如此类的所有论辩——智者们的最有价值的陈述往往在于那些前后相互矛盾的随口表述中。例如当色诺芬在某一节无意中透露苏格拉底曾在某一时期

① 不止一部关于柏拉图的杰作由于想当然地认为，如《会饮篇》中苏格拉底的伟大形象是柏拉图本人部分心理的自我启示，而降低了它们的学术水准。上述观点正确与否，至少不能凭一己之成见。

做过一群研究科学的学生的领袖，^①在另一处他说苏格拉底掌握当时最发达的天文学地理学知识，^②在第三处又说他与国外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交往密切，^③他也就破坏了他本人的陈述；所有这些矛盾都赋予他的证据以特殊意义。即使我们假设色诺芬的确读过柏拉图的对话如《斐多篇》，并且以之为源泉，那也不过证明他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他发现柏拉图的表述与他所知道的苏格拉底正好吻合。如果我们在这种提示下再次阅读色诺芬，我相信将会发现他对于那位哲学家的解释和柏拉图的所有描述没有任何严重的矛盾，有时甚至以极显著的方式对柏拉图的陈述加以强调突出。

我们依然得面对这么一个主要反对意见，即不能把柏拉图的对话集看成是对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生活和思想的忠实记录。很显然没有柏拉图我们将不会得到任何有关苏格拉底个性的传记资料；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中给出了一个异常丰满、清晰且内部一致的主要人物形象。但是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从头到脚都不是一种创造性想象的产物，正如奥赛罗或者福斯塔夫，如今它们依然经常上演，尽管无法确信它们在50年前上演的时候就是现在这种形象。我们能够给出一个充足的理由去拒斥这个曾被普遍接受的信念吗？竭力去证明这一点可能需要整整一本书，但是在此我只指出几

① 《回忆苏格拉底》，I. vi. 14。

② 《回忆苏格拉底》，IV. vii. 2—6。

③ 《回忆苏格拉底》，I. ii. 48。